

夏曾佑集

上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楊 琥 編

夏曾佑集

上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出版委員會

(按姓氏筆畫排序)

于沛 成崇德 朱誠如 李文海

孟超 馬大正 徐兆仁 陳樺

鄒愛蓮 戴逸

總序

戴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採納衆見，決定啓動此新世紀標誌性文化工程。

清代爲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衆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采集史料，廣搜確証，以爲依據。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跡。故史料爲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升爲理性之認識，才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於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巋然聳立於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飄渺之中。吾儕於編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爲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質量；二爲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爲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爲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衆，至清代而浩如煙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羣籍，手抄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餘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鈎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

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千萬件。檔案為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於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瞭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瞭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燬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聯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巨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為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梁。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嫻詩文，各握靈蛇之珠，衆懷崑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凌，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度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漸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度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台灣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於瀋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於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摺、錄副奏摺。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歷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傣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英法聯軍時遭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抄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誌、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目，尋訪必有所獲。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抄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國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在太平軍區域內，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燬，現在中國，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攜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國圖書館中保存之

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內，向達、蕭一山、王重民、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穫甚豐。

四曰新。清代為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攜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鬥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云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變化，出現衆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傣文、彝文書寫之文書，構成爲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爲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巨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絡，設數據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沓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爲浩歎。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沾溉將來，是所願也。

前言

夏曾佑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學者、詩人、政論家和思想家。他是戊戌維新運動時期的活躍人物，其思想和主張對晚清思想、文學都產生過重要影響，曾被梁啟超譽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詳後）。他所撰寫的《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即《中國古代史》）一書，嚴復在當時即稱之為“曠世之作”，此後曾經多次再版，對後世史家錢穆、顧頡剛的研究有很大的啟發（詳後）。夏曾佑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史學史、文學史上均佔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這樣一位重要的學者和思想家，迄今為止，却無一部將其論著收录齐全、編校精良的文集。夏曾佑的論著，除了《中國古代史》一書曾數次刊行外，長期以來，我們都不知道他發表過哪些文章，有多少篇。資料的匱乏，極大地限制了學術界對夏曾佑的研究，使其思想長期湮沒不彰，這與他的學術貢獻和歷史地位很不相稱。有鑒於此，編者搜輯、整理了這部夏氏文集。本集收录了夏曾佑發表在《時務報》、《國聞報》、《新民叢報》、《中外日報》、《東方雜誌》等近代報刊上的大量政論，夏氏 1881 年至 1905 年的日記，以及詩歌、書信、專著等其他論著。本文集是夏氏論著的第一次結集，不僅為研究夏曾佑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對於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學術、文化以及報刊也均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夏曾佑（1863—1924），字穗卿，號碎佛，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其父夏鸞翔（1823—1864），字紫笙，是晚清著名數學家，對中西數學均有研究，著有《少廣緹鑿》、《洞方術圖解》等算學書，與李善蘭、戴煦并稱為杭州算學三大家。夏曾佑出身望族，但年幼失怙。少時聰敏好學，泛覽羣書，曾入杭州敷文書院、紫陽書院等處學習。又曾隨伯父夏鳳翔遊歷上海、廣州等地，目睹了 19 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

1888 年（光緒十四年），夏曾佑參加戊子科浙江鄉試，中式第二十八名。1890 年（光緒十六年）赴京參加會試，獲會元，殿試二甲第八十七名，賜進士出身。次年游歷廣東、香港、武昌等地，並結識陳三立、楊銳和鍾天緯。1892 年（光緒十八年）返京，授禮部主事。是年在京初識梁啟超，後與康有為、梁啟超師徒交往頻繁。甲午戰爭爆發後，於 1894 年（光緒二十年）底離京南下返杭州。不久，赴武昌，與表兄汪康年、朋友葉瀚一起在武昌兩湖書院任教職，期間結識黃遵憲、吳鐵橋等維新人士。

1896 年（光緒二十二年），夏曾佑再度入京，任職禮部，後至密雲任教職。是年結識譚嗣同、嚴復。次年年初，夏氏至天津，在育才館任教職，期間與嚴復、王修植等創辦《國聞報》，並任主編。在其主持下，《國聞報》刊載嚴復譯著，宣傳西方學術，提倡維新變法思想，成為當時國內最有影響的報紙之一。1898 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政變後，夏氏初避禍南歸，後又入京候選。1899 年（光緒二十五年）冬，夏曾佑被選授為安徽祁門知縣，不久赴安徽任職。三年

後(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卸任,特旨以直隸州知州遇缺即補。卸任後,夏氏寓居上海,旋丁母憂,守制不仕。1903年至1905年居上海期間,夏氏任《中外日報》主筆,並致力於編撰《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一書(193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大學叢書”,將該書收入重版,並更名為《中國古代史》,後來通常稱為《中國古代史》)。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夏氏隨清政府出洋五大臣赴日本考察憲政,歸國後編撰《憲政初綱》,發表《刊印憲政初綱緣起》,呼籲清政府訂立憲法,實行憲政。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夏氏再赴安慶,充安徽省提學使司學務公所圖書課長,旋任安徽直隸州廣德知州、泗州知州,後任學部二等諮議官。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先後任北京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高等文官甄別委員會委員和京師圖書館館長等職。1924年病逝於北京。

夏曾佑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貢獻和影響是多方面的,在許多方面做了開拓性的工作。

一、“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

1924年4月,夏曾佑逝世之後,當時的學界領袖梁啟超得到消息,心情沉痛地撰寫了《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同時發表於在當時享有盛譽的《晨報》副刊和《東方雜誌》。在這篇哀悼文中,梁啟超說:

近十年來,社會上早忘却有夏穗卿其人了。……但是,若讀過十八九年前前的《新民叢報》和《東方雜誌》的人,當知其中有署名“別士”的文章,讀起來令人很感覺他思想的深刻和卓越。“別士”是誰?就是穗卿。

穗卿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

穗卿是我少年做學問最有力的一位導師。(《亡友夏穗卿先生》,已收入本書附錄)

而在4年前完成的《清代學術概論》中,梁啟超回顧、總結他青年時期的思想演變時,就曾指出:

啟超屢游京師,漸交當世士大夫,而其講學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譚嗣同。曾佑方治龔、劉今文學,每發一義,輒相視莫逆。……而啟超之學,受夏、譚影響亦至巨。^①

梁啟超如此高度評價夏曾佑,並非偶然。事實上,早在戊戌維新運動發生之前,夏氏即被他同時代的維新人士王修植、鍾天緯、康有為等稱贊為“梨洲嫡派”、“定盦化身”,是當世的黃宗羲與龔自珍^②。宋恕在與友人的通信中,亦極力推崇夏曾佑:

穗公聰通,拔俗尋丈,定盦之后,几見斯人?^③

進入民國以後,蔡元培撰寫的《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以很多篇幅介紹夏曾佑的思想,並給予極高評價^④。錢玄同在為劉師培遺書撰寫的序言中,列舉了此前50年“中國學術革新時代”的代表人物12人,夏曾佑為其中之一^⑤。

①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朱維鈞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第68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宋恕:《致夏穗卿書》,胡珠生編,《宋恕集》第526頁,中華書局1993年版。

③ 宋恕:《致姚頤仲書》,《宋恕集》第551頁。

④ 蔡元培:《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124頁至131頁,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⑤ 錢玄同:《〈劉申叔先生遺書〉序》,《錢玄同文集》第4卷,第319頁至320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衆多學者、名家推崇夏曾佑，由此可見夏氏之思想在當時的影響之大、地位之重要。在此，略舉戊戌維新前後夏氏的“排荀”主張數端，以見其思想之特色。

近代中國的落後，西方列強入侵以及隨之而來的西方文化的傳播，迫使中國統治階級和知識分子中一部分思想敏感的仁人志士尋求新的救亡之路，他們在向西方學習先進技術、先進思想、先進文化以及先進制度的同時，不得不思考造成中國近代政治黑暗、思想閉塞和社會落後的原因。在這些仁人志士中，康有爲無疑是戊戌維新時期的代表人物，他於1891年發表的《新學偽經考》，提出造成中國社會落後的禍首是西漢末的古文經學派的領袖劉歆。康有爲的這一激烈觀點，衝擊了人們長期信奉的正統觀念，引起了保守官僚及部分士大夫的反對。事實上，康有爲的這一觀點，在學術上非常武斷，因此即使在維新派內部，也有不同的看法。針對康有爲的觀點，在南方很有影響的維新派學者宋恕就提出，“長夜神州之獄”應歸於叔孫通、董仲舒、韓愈、程頤（及程顥）。而夏曾佑則對康有爲和宋恕的觀點都不贊成。相反，夏氏提出，“長夜神州之獄，歸重蘭陵”^①，認為中國落後的禍首在於曾經做過楚國蘭陵令的荀況，而并非劉歆或其他人。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夏曾佑在答宋恕函中，最早表達了這一見解。他說：“孔子之教”在流傳中，“諸弟子有全聞者，有半聞者。全聞者知君主之後，即必有君民并主與民主，故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其不全聞者，不知後二，但知初一，故言性惡而法後王”。“蓋教門之宗子，所學者爲帝王之學，而其他爲輔也。而荀卿乃此中之一支”。夏氏認為，由於荀卿的弟子李斯相秦，“大行其學，焚坑之烈，絕滅正傳，以吏爲師，大傳家法”。因此，叔孫通、董仲舒都是荀子之徒，西漢十四博士多半出於荀學。“蓋中國之各教盡亡，惟存儒教，儒教之大宗亦亡，惟存謬種，已二千年於此矣”。無論是康有爲提出的劉歆的經古文學，或是宋恕提出的北宋二程等之性理學說，“皆賊中之賊，非其渠魁”，而韓愈“不過晚近一辭章之徒”，“其己心亦不自以爲一定，俳優而已”。在夏氏看來，導致中國“晦蒙否塞，長夜不暘，萬事凌夷，遂有今日”的根本原因，在於“素王之道淆於蘭陵，蘭陵之道淆於新師，新師之道淆於偽學”。所以，康、宋二人的見解，“譬猶加穿窬之盜以篡竊之名”，沒有擊中要害^②。

如果說這是夏氏在與友人私信中所展現的“思想火花”，那麼，在1898年發表的《論近代政教之原》一文中，夏曾佑公開宣稱：世人信仰和尊奉的孔子之道、聖人之道，并非真正的孔子之道，而是經過後世帝王改造的爲其統治服務的“秦人之教宗”。他指出：

惟我神（洲）〔州〕，建國最早，文、周、孔、孟之聖，《易象》、《春秋》之經，其法繁備，其道變化，率而循之，萬世無弊可也，與埃及等邦之古教一成而不變者不同也。然則何爲而成此一成不變之俗哉？曰禍始於秦而已。今日之政法，秦人之政法，非先王之政法也；今日之學術，秦人之學術，非先王之學術也；今日之教宗，秦人之教宗，非先王之教宗也。

秦人創業垂統幾三千年，至今日而始覺其不可用，豈偶然哉？蓋必有微言眇指以運乎其間矣。……祖龍與韓非、李斯，相契若是之深也，是以秦人一代之政，即荀子一家之學，千條萬派，蔽以一言，不過曰“法後王”與“性惡”而已。惟法後王，故首保君權。古之

① 宋恕：《致夏穗卿書》，《宋恕集》第526頁。

② 以上引文均見夏曾佑《致宋恕書》。本文所引夏氏言論，均已收入本書，故祇注篇名，其他出處從略。

治天下也，以民爲本位，故井田、學校、封建，均從宗法而積之；今之治天下也，以君爲本位，故財賦、兵刑、建置，均從天子以推之。惟人之性惡，故猜防禦下。古之人知天下之可爲君子，故衣裳鐘鼓之化，達乎上下；今之世料天下之必爲小人，故凡食貨、選舉、職官一切諸政，非以求進化也，防流弊也；非以待馴良也，禦盜賊也；非以禮士夫也，蓄奴隸也。（《論近代政教之原》）

儘管對於中國社會長期信奉的聖人——孔子本人及其學說，夏氏尚不敢直接予以批判，但他通過考察中國古代政教的起源尤其是儒家學說在歷史上的演變，揭示了世人所尊奉的聖人之道已被荀子、李斯、秦始皇所污染和敗壞，而由秦始皇開創並爲後世中國古代君王所繼承的“陽儒陰法”的“政教”，是造成中國社會黑暗落後的主要罪魁禍首。這種觀點在當時乃石破天驚之語，具有極大的衝擊力。

稍後，在《論八股存亡之關係》一文中，夏曾佑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指出，孔子之道在後世分爲孟、荀二派，但孟學無傳，荀學則大行其道：

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孟子稱堯舜，荀子法後王；孟子論孔子，推本於《春秋》，荀子言孔子，推本於《禮》，此其大端矣。若其小節，更仆難終。孟子既沒，公孫丑、萬章之徒，不克負荷，其道無傳。荀子身雖不見用，而其弟子韓非、李斯等，大顯於秦。秦人之政，壹宗非、斯，漢人因之，遂有今日。漢世六經家法，強半爲荀子所傳，而傳經諸老師，又多故秦博士，則其學必爲荀子之學無疑。故先秦兩漢皆蘭陵之學，而非孔子之宗子也。（《論八股存亡之關係》）

夏曾佑批判荀子，不是發思古之幽情，也不是從荀子學說本身出發去理解荀子，而是從他自己的政治觀念、政治立場出發，即從反對既存“政教”的政治需要出發，借批判“荀學”而批判當時人們所崇奉和信仰的“政教”。他這樣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求變法，要求改革現存的舊“政教”，重建符合時代需要的新“政教”。因此，他的結論是：

夫以秦法爲因，而遇歐洲諸國重民權輿格致之緣，於是而成種亡教亡之果。昔人有言：聖人之道，與時消息，生今反古，災及其身。事至今日，使其道真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所傳，猶當斟酌損益，與時偕行，而況所守者，乃秦人之法哉！（《論近代政教之原》）

在前揭紀念夏氏文中，梁啟超說在戊戌維新時期，他和夏曾佑、譚嗣同等共同發起“排荀運動”：“清儒所做的漢學，自命爲荀學。我們要把當時壟斷學界的漢學打倒，便用擒賊擒王的手段去打他們的老祖宗。”（《亡友夏穗卿先生》）並說“彼輩排荀運動，實有一種元氣淋漓景象”^①。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近代，首倡“排荀”主張的學者正是夏曾佑。他不愧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

夏曾佑的“排荀”主張，在當時及後世都產生了一定影響。正面的例子是譚嗣同。譚嗣同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二者交相資。”^②這些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名言，而這一說法的來源無疑是夏曾佑^③。通過譚嗣同的文章，辛亥、五四一代的學子多受到夏、譚“排荀”主張的影響，

①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第69頁。

② 譚嗣同：《仁學》，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冊，第337頁，中華書局1990年版。

③ 朱維鈞：《晚清漢學：“排荀”與“尊荀”》，收入《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如李大釗即在《民彝與政治》、《鄉愿與大盜》等文中多次闡述了這一觀點。反面的例子是章太炎，他在戊戌維新前後撰寫了《尊荀》一文，並列於《嘯書》的首篇，展開與“排荀”主張者的對話和辯難，顯然，此乃夏曾佑主張引起的反彈^①。

二、中國近代新史學的開拓者

如果說夏曾佑關於荀學與秦政之關係的深刻見解，最初僅限於友朋之間的通信傳播，後來才逐漸擴大影響，那麼，他所撰寫的《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下文簡稱《中國古代史》）一書，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世，都產生了廣泛而持久的影響。

《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一書，原本為晚清的一部中學歷史教科書，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原計劃五冊，完成三冊）。該書撰寫於1903年至1905年，商務印書館於1904年出版第一冊，1905年出版第二冊，1906年出版第三冊。在1906年以後的幾年內，該書多次印行（據《張元濟日記》第468頁記載，到1918年初，三冊已發行7萬9千多冊到12萬餘冊不等）。193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大學叢書”，將該書收入重版，並更名為《中國古代史》，夏著也因而由中學教科書升格為大學教材，並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多次再版發行。1955年，三聯書店據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三版重新刊印。20世紀90年代初，上海書店出版的《民國叢書》又將《中國古代史》（據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影印）列入第二編歷史地理類。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在其“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系列叢書中，將《中國古代史》選為第一種，與另外32種史學名著並列重新出版，並於2003年重印。2006年，團結出版社對原書配以插圖，重新分卷，出版了插圖本《中國古代史》（上下冊）。夏氏《中國古代史》在百餘年間，從中學教科書，到大學用書，到20世紀史學名著，地位不斷升格，反映了該書在史學界的崇高地位及持續影響。

《中國古代史》是一部未完成的中學教科書，何以會產生如此持久的影響？該書究竟有何特色與貢獻？該書出版後，當時的出版界曾給予高度評價，一份銷售廣告稱：“敘述古今，以十三經、二十四史為主，而緯以群籍。其體裁則兼用編年、紀事二體，其宗旨則在發明今日社會之本原，故於宗教、政治、學術、風俗，古今嬗變之所以然，志之獨詳。此為從前編中國歷史教科書所未有，而為本篇之特色也。至於篇中博采異說，悉注原書於下。學者可以按書翻檢，隨時觸發，其益無方，尤便於學堂講習之用。”^②客觀地說，這份廣告確實抓住了《中國古代史》一書的部分特點。據此提示，編者曾反覆閱讀夏氏此書。編者以為，該書的特色在於：

（一）從當前社會變革的現實需要出發，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探尋救亡圖強、解決現實問題之法。

《中國古代史》開宗明義，申明其著述宗旨是：

智莫大於知來，來何以能知，據往事以為推而已矣。故史學者，人所不可無之學也。……洎乎今日，學科日侈，日不暇給，既無日力以讀全史，而運會所遭，人事將變，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於古人證其因，即無以知前途之夷險，又不能不亟讀史，若是者將奈之何哉？是必有一書焉，文簡於古人，而理富於往籍，其足以供社會之需乎！今茲此編，

^① 參閱朱維鈞《晚清漢學：“排荀”與“尊荀”》；又拙作《戊戌時期章太炎尊荀思想及其中西學術淵源》，收於《傳統思想的近代轉換》，社科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

^② 周振鶴編：《晚清叢書目》第227頁，上海書店2005年版。

即本是旨。(第一冊《叙》)

這就是說，他撰寫歷史著作的目的，並不僅僅是講述歷史知識，而是為了探究歷史演變之因果，尋求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法。祇有深入研究歷史，才能更加看清當前社會積弊積弱的症結所在，找到解救的良法。而通過瞭解歷史與現實的聯繫，又能使人們清醒地認識目前所處的環境與時代，從而推知將來或發生更大的危機，或通過變革而獲得新生。他舉例說：

讀我國六千年之國史，有令人悲喜無端，俯仰自失者。讀上古之史，則見至高深之理想，如大《易》然。至完密之政治，如《周禮》然。至純粹之倫理，如孔教然。燦然大備，較之埃及、迦勒底、印度、希臘，無有愧色。讀中古之史，則見國力盛彊，逐漸用兵，合閩、粵、滇、黔、越南諸地為一國，北絕大漠，西至帕米爾高原，哀然為亞洲之主腦，羅馬、匈奴之盛，殆可庶幾，此思之令人色喜自壯者也。洎乎讀近今之史，則五代之間，我之傭販、皂隸，與沙陀、契丹，狂噬交捽，衣冠塗炭，文物掃地，種之不滅者幾希。趙宋建國，稍稍稱治，然元氣摧傷，不可猝起，而醫國者又非其人。自此以還，對外則主優柔，對內則主壓制，士不讀書，兵不用命，名實相反，主客易位，天下愁歎，而不知所自始，其將蹈埃及、印度之覆轍乎！此又令人悵然自失者矣。(第一篇第一章第五節《歷史之益》)

然而，物極必反，歷史的演變發展又是辯證的，中國社會的自身變化與西方衝擊相遇，預示着中國面臨着空前的大變局，而未來亦將有新的命運、新的前途：“雖然，及觀國朝二百餘年間，道光以前，政治、風俗雖仍宋明之舊，而學問則已離去宋明，而與漢唐相合；道光以後，與天下相見，數十年來，乃駸駸有戰國之勢。於是識者知其運之將轉矣，又未始無無窮之望也。”他強調指出：

夫讀史之人，必悉其史中所陳，引歸身受，而後讀史乃有益。(第一篇第一章第五節《歷史之益》)

這也正是夏氏著史之意。在第二冊的開頭又再次強調：“本冊用意與第一冊相同，總以發明今日社會之原為主。”(第二冊《凡例》)“今中國之前途，其禍福正不可測。古人之功罪，亦未可定也。而秦、漢兩朝，尤為中國文化之標準。以秦、漢為因，以求今日之果，中國之前途，當亦可一測識矣。”(第二篇第一章第一節《讀本期歷史之要旨》)強烈的現實關懷，把總結歷史與當時社會變革的緊迫需要緊密結合起來，是《中國古代史》在當時深受廣大讀者歡迎之重要原因。

(二) 運用西方新知、新理來分析和解說中國古代歷史，改造中國正史系統。

《中國古代史》是夏曾佑運用西方社會、歷史、文化知識的新眼光、新視角，考察、分析和解說中國歷史的一部探索之作，也是嚴復傳播西方進化論、社會學等新知以來在中國史學界首先結出的碩果。

本來，在當時的思想界，夏曾佑對西方知識的瞭解遠遠超過一般人，早在1890年前後，他就拜訪西方傳教士傅蘭雅等人，向其請教，認真鑽研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和歷史知識。在1896年與嚴復結識之後，“衡宇相接，夜輒過談，談輒竟夜，微言妙旨，往往而遇”(《致汪康年書·十三》)。他如飢似渴地汲取西方新知，掌握了當時西方傳入的進化論與社會科學理論，“學問大進”。在《中國古代史》中，他將這些新知融入對人類歷史和中國歷史的分析上。如他論述人類的起源時，即揭示出達爾文進化論學說與宗教神學的對立。他指出：

人類之生，決不能謂其無所始。然言其所始，說各不同，大約分為兩派。古言人類

之始者，爲宗教家；今言人類之始者，爲生物學家。宗教家者，隨其教而異，各以其本羣最古之書爲憑。世界各古國，如埃及(Egypt)、巴比倫(Babylon)、印度(India)、希伯來(Hebrew)等，各自有書，詳天地剖判之形，元祖降生之事，其說尚在，爲當世學者所知。而我神(洲)[州]，亦其一也。……至於生物學家者，創於此百年以內，最著者英人達爾文(Darwin)之種源論(Origin of Species)。其說本於考察當世之生物，與地層之化石，條分縷析，觀其會通，而得物與物相嬗之故。由古之說，則人之生爲神造；由今之說，則人之生爲天演，其學如水火之不相容。(第一篇第一章第一節《世界之初》)

在書中有多處，他又以西方社會科學尤其是嚴復介紹與改造的甄克斯學說來解說中國古代社會。如談到包犧氏時說：

案包犧之義，正爲出漁獵社會，而進游牧社會之期，此爲萬國各族所必歷。但爲時有遲速，而我國之出漁獵社會爲較早也。始制嫁娶，則離去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之陋習，而變爲家族，亦爲進化必歷之階級。(第一篇第一章第七節《包犧氏》)

而對於中國古史中關於神農氏的傳說，夏氏分析說：

案此時代，發明二大事，一爲醫藥，一爲耕稼。而耕稼一端，尤爲社會中至大之因緣。蓋民生而有飲食，飲食不能無所取，取之之道，漁獵而已。……故凡今日文明之國，其初必由漁獵社會，以進入游牧社會。自漁獵社會，改爲游牧社會，而社會一大進。蓋前此之蚤暮不可知，鉅細不可定者，至此皆俯仰各足，於是民無憂餒陟險之害，乃有餘力以從事於文化。且以游牧之必須逐水草，避寒暑也，得以曠覽川原之博大，上測天星，下稽道里，而其學遂不能不進矣。雖然，游牧之羣，必須廣土，若生齒大繁，地不加闢，則將無以爲游牧之場。故凡今日文明之國，其初必又由游牧社會，以進入耕稼社會。自游牧社會，改爲耕稼社會，而社會又一大進。蓋前此櫛甚風沐甚雨，不遑寧處者，至此皆可殖田園，長子孫，有安土重遷之樂，於是更有暇日，以擴其思想界。且以畫地而耕，其生也有界，其死也有傳，而井田、宗法、世祿、封建之制生焉。天下萬國，其進化之級，莫不由此。(第一篇第一章第九節《神農氏》)

在這裏，夏氏運用“漁獵社會”、“游牧社會”、“耕稼社會”等三種社會形式來分析中國史籍傳說中的古史，論述了人類社會的生活需要如何促進了生產發展與文化進步，各種國家制度又如何產生，社會又如何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演進。夏氏的這種認識與分析，反映了近代中國人對人類歷史進程的理解和認知正在發生重要變化，開始認識到人類歷史是不斷由低級向更高階段發展的。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來說，這是以前聞所未聞的新知識，具有巨大的啓迪作用。

在進化論、社會學理論的指導下，夏曾佑結合自己早年對中國歷史的研究與考察，提出了一套關於劃分中國歷史演進之發展階段的完整的學說。他指出：

中國之史，可分爲三大期。自草昧以至周末，爲上古之世；自秦至唐，爲中古之世；自宋至今，爲近古之世。若再區分之，求與世運密合，則上古之世，可分爲二期。由開闢至周初，爲傳疑之期，因此期之事，并無信史，均從羣經與諸子中見之，經、史、子之如何分別，後詳之。往往寓言、實事，兩不可分，讀者各信其所習慣而已，故謂之傳疑期。由周中葉至戰國爲化成之期，因中國之文化，在此期造成，此期之學問，達中國之極端，後人不過實行其諸派中之一分，以各蒙其利害，故謂之化成期。中古之世，可分爲三期。

由秦至三國，爲極盛之期，此時中國人材極盛，國勢極疆，凡其兵事，皆同種相戰，而別種人則稽顙於闕廷。此由實行第二期人之理想而得其良果者，故謂之極盛期。由晉至隋，爲中衰之期，此時外族侵入，握其政權，而宗教亦大受外教之變化，故謂之中衰期。唐室一代，爲復盛之期，此期國力之疆，略與漢等，而風俗不逮，然已勝於其後矣，故謂之復盛期。近古之世，可分爲二期。五季、宋、元、明爲退化之期，因此期中，學殖荒蕪，風俗凌替，兵力、財力逐漸摧頹，漸有不能獨立之象。此由附會第二期人之理想，而得其惡果者，故謂之退化期。國朝二百六十一年爲更化之期，此期前半，學問、政治集秦以來之大成，後半世局人心，開秦以來所未有。此蓋處秦人成局之已窮，而將轉入他局者，故謂之更化期。此中國歷史之大略也。（第一篇第一章第四節《古今歷史之大概》）

在這裏，夏氏高屋建瓴地將中國歷史劃分爲三大發展階段，在這三大發展階段中，又依據史籍疑信、國勢強弱、文化風俗興衰、種族關係等分爲七個小的發展階段。而在每一階段，他着重論述此一時期的主要特點。他說：

是編分我國從古至今之事爲三大時代，又細分之爲七小時代。每時代中於其特別之事加詳，而於普通之事從略。如言古代則詳於神話，周則詳於學派，秦則詳於政術是也。（《凡例》）

而在具體的論述中，夏氏並不是簡單地摒棄中國傳統史學的王朝體系，而是仍借用王朝體系，同時以歷史分期重新劃分發展段落，統領王朝更替，重新解釋各個王朝之興盛、衰亡的歷史過程。夏氏這種做法，是以新理、新知解說本國故舊史事、史籍、史實，實質是改造了中國舊式史學，改造了中國正史系統。這是一種新舊糅合、推陳出新的做法。可以說，《中國古代史》一書既是清末民初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重新解讀中國歷史的探索與嘗試之作，也是中國近代新史學實踐中所產生的真正的典範之作。

（三）以“政教”、“風俗”、“種族”爲核心，探究民族國家興亡、盛衰之因，爲現實政治變革提供歷史依據。

事實上，在撰寫《中國古代史》之前，夏曾佑對中國古代的歷史演變就做過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套獨立的見解。早在 1895 年致友人信中，他就提出：

中國政教，以先秦爲一大關鍵。先秦以後，方有史冊可憑；先秦以前，所傳五帝三王之道與事，但有教門之書，絕無國家之史。教書者各以己之教旨寄跡古人，以自取重。故言堯、舜、文、武之若何用心、若何立政，百家異說，莫可折衷，其同歸依託則一也。（《致宋恕書》）

同時，夏曾佑又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思想和學者，他不僅運用進化論、社會學理論來分析中國歷史，而且悉心研究了世界各個民族的古代歷史，尤其是歐洲宗教改革、文藝復興的歷史。在爲嚴復翻譯的甄克斯《社會通詮》所作序言中，夏氏揭示了“宗教”與“政治”互相爲用的關係：

宗教、政治必相附麗。不然，不可以久。其由甲政治以入乙政治也，必有新宗教以慰勉之，而其將出乙政治以入丙政治也，例先微撼其宗教，而後政治由之而蛻。未有舊教不裂，而新政可由中而蛻者。故其宗教與政治附麗疏者，其蛻易；其宗教與政治附麗密者，其蛻難。此人天之大例矣。人之於宗法社會也，進化所必歷也。而歐人之進宗法社會也最遲，其出之也獨早，則以宗教之與政治附麗疏也。吾人之進宗法社會也最早，

而其出也歷五六千年，望之且未有厓，則以宗教之與政治附麗密也。（《〈社會通詮〉序》）因之，他在考察中國歷史之時，時時與其他民族的歷史進行比較和對照，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以“政教”、“風俗”、“種族”為核心，探究國家、民族興亡之演變因果。他說：

討論歷史，幾無事不與宗教相涉，古史尤甚，故先舉此以告學者，庶幾有所別擇焉。（第一篇第一章第一節《世界之初》）

凡國家之成立，必憑二事以為型範，一外族之逼處，二宗教之薰染是也。此蓋為天下萬國所公用之例，無國不然，亦無時不然。此二事明，則國家成立之根本亦明矣。本書所述，亦以發明此二事為宗旨。……而本篇則尤為此二事轉變之時代。蓋此時以前，種族與宗教皆單簡；自此以後，種族與宗教皆複雜也。（第二篇第二章第一節《讀本期歷史之要旨》）

他在介紹第二冊之撰寫宗旨時，再次強調：

文字雖繁，其綱只三端：一、關乎皇室者，如官庭之變，羣雄之戰，凡為一代興亡之所繫者，無不詳之。其一人一家之事，則無不從略，雖有名人，如與所舉之事無關，皆不見於書。一、關乎外國者，如匈奴、西域、西羌之類，事無大小，凡有交涉，皆舉其略，所以代表。一、關乎社會者，如宗教、風俗之類，每於有大變化時詳述之，不隨朝而舉也。執此求之，則不覺其繁重矣。（第二冊《凡例》）

夏氏的這一主張，體現在許多具體的論述中。例如，他在第二篇中說：“中國之教，得孔子而後立。中國之政，得秦皇而後行。中國之境，得漢武而後定。三者皆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也。”（第二篇第二章第一節《讀本期歷史之要旨》）在論述到他們時，夏氏不僅用了很多篇幅去講述孔子、秦始皇、漢武帝三人個人的生平事跡及歷史，而且專門分析了“孔子與六經之關係”、“秦與中國之關係”和漢朝與當時邊疆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可以說，在全書的寫作中，夏氏均貫穿了這一原則和精神。

夏氏如此重視“政教”、“種族”、“風俗”，是中國辛亥革命前夕在列強入侵、民族危亡的條件下，先進士人要求政治變革、思想變革之現實的反映。他講述的是歷史上的“政教”，其目的則在於現實中如何對待清政府、如何對待孔子儒教，即如何“革政”、“改教”。在為《社會通詮》所作序言中，他明確地表達了在中國當時的環境下著史的現實意義：

孔子之術，其的在於君權，而徑則由於宗法。蓋籍宗法以定君權，而非借君權以維宗法。然終以君權之借徑於此也，故君權存而宗法亦隨之而存，斯託始之不可不慎矣。

自漢以來，用秦人所行之主術，即奉秦人所定之是非。秦之時，一出宗法社會而入軍國社會之時也。然而不出者，則以教之故。故曰：鈐鍵厥惟孔子也。政治與宗教既不可分，於是言改政者，自不能不波及於改教。

夫歐人之變法，爭利害耳，而其慘礫已如此。我國之變法，乃爭是非，宜其難阻之百出也。雖然，人心執著之理，不可以口舌爭，惟臚陳事物之實跡，則執著者久而自悟。泰西往例，莫不如斯。（《〈社會通詮〉序》）

夏氏的好友嚴復，對夏氏著史的心思和用意是非常清楚的，他說：

史之所守固何事乎？曰：惟有關於為政、治人之事實。是故歷史、政制，相為根實，史學者，所以為立憲張本者也。

國群者，有機之生物也，其天演之所歷，與動植同。使其天演之程度稍高，則有不可

離之現象，政府是已。政府之成，有成於內因者，有範於外緣者。內因，宗教爲之綱；外緣，鄰敵爲之器。今觀大著，於宗教、外族特詳，得其理矣。^①

因此，嚴復稱道夏氏之書是“曠世之作”^②。

（四）學西學而不盲從，獨立思考，從中國歷史、文化本身的特性出發認識中國，對中國歷史演變提出了許多啓人心智的精闢論斷，開啓了後世史家研究的新方向、新領域、新問題。

如前所述，夏氏《中國古代史》所體現之吸收和運用西方新知的特點是非常突出的，顯示了夏氏開放的態度與胸懷。但是，夏氏對於當時傳入中國的西方新知，并非盲目接受，而是認真分析、鑒別，將西方新知與中國史實比較，有所選擇地吸收。夏氏對“中國文化西來說”的否定，就反映了他獨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的精神與見解。

清末，尤其是19、20世紀交替之際，對於中國人種和文明的起源問題，東西方學者曾做出種種考釋，提出種種說法。衆說紛紜中，最能博得中國知識界讚賞和信從的則是巴比倫和帕米爾——昆侖山兩種西來說。巴比倫說的發明者是法國漢學家拉克伯里。他力主兩河流域的古巴比倫是世界文明發源地，中國人種和文明都由此來。他認爲，西元前23世紀左右，原居西亞巴比倫及愛雷姆一帶已有高度文明之迦克底亞-巴克民族，在其酋長奈亨台率領下大舉東遷，自土耳其斯坦，循喀什噶爾，沿塔里木河以達昆侖山脈，輾轉入今甘肅、陝西一帶，又經長期征戰，征服附近原有之野蠻土著部落，勢力深入黃河流域，遂於此建國。酋長奈亨台即中國古史傳說中的黃帝；昆侖即“花國”，因其地豐饒，西亞東遷民族到達後便以“花國”命名之，所以中國稱“中華”^③。該說經日本傳入中國，得到部分知識份子的贊同。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黃節、蔣智由等人，相繼援引古史，多方比附，深信不疑。

然而，熱心向西方學習的夏曾佑對這種從西方傳來的流行觀點並不贊同，他指出：

近人言吾族從巴比倫遷來，據下文最近西曆一千八百七十餘年後，法、德、美各國人，數次在巴比倫故墟掘地所發見之證據觀之，則古巴比倫人與歐洲之文化相去近，而與吾族之文化相去遠，恐非同種也。（第一篇第一章第三節《中國種族之原》）

他引證中國典籍中的大量材料，包括神話傳說，說明中國文化的開創者爲黃帝，而“黃帝姓公孫，生於姬水，故姓姬，是本姓公孫，後改姬姓，名曰軒轅，少典之子。此爲炎帝同族之證”。“黃帝與炎帝，并居於黃河流域”。（第一篇第一章第十二節《黃帝與炎帝之戰》）并非從西方遷徙而來。他的這一論點後來被考古學家們的實證研究證明是正確的，中國文化確非來自西方。

一部優秀的著作是超越時代的。《中國古代史》至今仍受到推崇，在於夏氏在該書中，關於中國古代歷史演變，提出了許多新穎而獨到的見解和論斷。此類精彩之論斷甚多，此處不擬詳論，僅舉現代兩位著名史家的評論，以見夏氏之精闢見解及對後世史家的影響。

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在晚年的讀書筆記中，專門記述了他讀夏曾佑之書受到的啓迪：

予於一九〇八年，購得其所著《中等教育用中國歷史教科書》三冊，以基督教《創世紀》及保羅文記洪水事比較漢族歷代相傳之盤古以迄三皇五帝之傳統，耳目頓爲一新；

① 嚴復：《與夏曾佑書·三》，孫應祥、皮後鋒編，《嚴復集補編》第264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嚴復：《與夏曾佑書·三》，《嚴復集補編》，第263頁。

③ 見[美]馮客著、楊立華譯《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第109至112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李帆《民族主義與國際認同之間——以劉師培的中國人種、文明西來說爲例》，《史學理論研究》2005年第4期。

又以虞夏為傳疑時代，兩周為化成時代，使我讀《尚書》時之舊腦筋為之一洗，予壯年推翻古代傳說彼實導夫先路，而惜其全書未成，使讀者對我國歷史尚無整個之認識耳。^①

夏氏《中國古代史》以西方史事比較漢族之史，顧氏讀後“耳目頓為一新”，該書“以虞夏為傳疑時代，兩周為化成時代，使我讀《尚書》時之舊腦筋為之一洗”，而顧氏“壯年推翻古代傳說”，夏氏之書“實導夫先路”。由此可見，《中國古代史》為這位疑古健將、中國現代史上“古史辨派”的創始人打開了眼界，給予新穎的知識與見解。

中國現代史上另一位史學大家——錢穆，有更加詳細的回憶，他說 1913 年他在一所私立小學任教：

時余雖在小學任教，心中常有未能進入大學讀書之憾。見報載北京大學招生廣告……余又讀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因其為北京大學教本，故讀之甚勤。余對此書得益亦甚大。如三皇五帝，夏氏備列經學上今古文傳說各別。余之知經學之有今古文之別，始此。一時學校同事聞余言三皇五帝有相傳異名之說，聞所未聞，皆驚歎余之淵博。實不知余之本夏氏書也。又余讀夏氏書第一冊，書末詳鈔《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等，不加減一字，而篇幅幾佔全書三分之一以上。當時雖不明夏氏用意，然余此後讀史籍，知諸表之重要，則始此。及十年後，余為《先秦諸子系年》，更改《史記》六國年表，亦不可謂最先影響不受自夏氏。

又夏氏書皆僅標幾要點，鈔錄史籍原文。無考據方式，而實不背考據精神。亦為余所欣賞。惟其書僅至南北朝而止，隋唐以下即付闕如。斯為一憾事。此後余至北平教人治史，每常舉夏氏書為言。^②

從錢穆的回憶中，我們可知：第一，錢氏因讀夏史，認識在今古文典籍傳說中，三皇五帝的“相傳異名”。在《中國古代史》的“上古神話”至“帝嚳氏”等十一節中，夏曾佑旁徵博引，論述三皇五帝的異名及傳說。而更重要的，是錢穆由此而知“經學之有今古文之別”。而十多年後，錢氏撰成《劉向歆父子年譜》這部平息清末以來經今古文爭議的名著。錢氏受夏氏之書影響，不可謂不大。第二，錢穆的另一部名著《先秦諸子系年》，也受夏史直抄《史記》二表的影響。

眾所周知，顧頡剛、錢穆兩位史家的史學觀念在很多方面是對立的，但他們均從夏氏《中國古代史》中汲取了營養，說明該書中提出的論斷及其議論，為後來的史學家提示了研究的新方向、新領域和新問題；反過來說，顧、錢之著作與史學觀點不僅在現代史學界產生重大影響，而且至今仍擁有廣泛的普通讀者羣，夏氏之論斷通過顧、錢之書繼續發揮作用，其書之持久影響於此可見。

三、眼光敏銳的政論家

夏曾佑是一位眼光敏銳的政論家，在晚清報刊上的言論光彩燦燦，但又是一位長期被遺忘的政論家。

① 顧頡剛：《楓林村雜記·夏曾佑》，《顧頡剛讀書筆記》第 7294 頁，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1990 年版。

②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 89 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8 年版。